在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

“一带一路”引领区域经济合作

本报记者 徐惠喜

聚焦

亚洲区域合作成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是3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学术发布会上传出的重要信息。会上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和《亚洲竞争力报告》三大学术报告认为，在发达经济体吸纳亚洲经济体产品能力下降的背景下，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亚洲经济体的本土化合作，加速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分量愈来愈重。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博鳌亚洲论坛学术发布会上，与会嘉宾正在发言。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一带一路”造福沿线民众

“‘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全球化设想。”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表示，对沿线国家来讲，如果能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把各自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各自确定的发展目标都放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命运共同体前景可期。

与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异军突起。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下，中国的发展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诉求对接，催生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设想。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就是中国与有关国家有计划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区域合作项目。

互联互通建设便利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和人文往来。“一带一路”通过6大经济走廊，编织铁路、公路、海空航线构成的立体交通网和输电网络、通信网络及油气管网，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沟通沿线国家的经贸和交通网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中国企业承建了数十项示范性海外大型交通基建项目，关键通道、港口建设有力改善了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建环境。多条中欧班列的开通，则逐步形成了连接亚洲各次区域和亚欧之间的交通网络。在电信联系方面，建设了多条国际陆路光缆，大大方便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际间的联络。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呈现欣欣向荣局面。在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提示人们，全球化正以另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在深入发展，正在为各参与方带来发展红利，造福沿线各国民众。

本土化市场合作方兴未艾

近年来，随着域外市场对亚洲商品的排斥力度加大，亚洲内部经济体力图通过域内市场合作补偿外部市场损失，助推了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

为应对发达经济体战略调整带来的不利影响，亚洲各国和地区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增进跨境市场合作，推动经济增长。例如，蒙古提出了“草原之路”计划，印度提出了“季风行动”计划，土库曼斯坦提出了“大丝绸之路复兴”倡议，韩国提出了“欧亚倡议”，越南提出了“两廊一圈”等，这些计划或倡议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都致力于通过互联互通建设扩大各自生产要素组合的范围，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双方对接发展战略，有助于对各自消化富余产能，推进生产要素向国际产业链下游转移，形成了亚洲市场合作本土化的潮流。

专家指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已呈加速化趋势。去年中亚、西亚经济体不仅加强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助推经济一体化谈判，而且中东欧16国也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在南亚，印度加强了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联系，推进“季风行动”。中印两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已启动可行性研究。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为基本框架，多层面跨境合作共同发力，呈现出向纵深发展趋势。

以往，亚洲经济体在应对全球价值链呈现的结构性变化、内部市场狭小等挑战时，往往选择依靠本国自身力量来解决。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指出，“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亚洲经济体必须大幅增加彼此合作，实现地区共赢”。这正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动能。

新兴经济体分量愈来愈重

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缓慢回升以及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成效逐步释放，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势头得到抑制，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的发展态势。去年，G20成员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E11）的经济增速为4.4%，较上年仅轻微回落0.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1%。E1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提高到了6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持续增加。这表明，当前新兴经济体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G20杭州峰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精诚合作，与发达经济体一道共同推动制定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两份文件以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复苏和发展，为新形势下应对保护主义、推动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建立了新的制度框架。

但是，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济体报告》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出现向好势头，但仍将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发社会不稳定等问题均不容忽视。在外部需求疲软、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以及内需增长乏力等压力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相互之间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合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观察

加

杨忠阳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23日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7年度报告》显示，除了人文交流仍快速发展外，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贸易、生产和金融等衡量指标上均遭遇停滞或倒退。

之所以如此，既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有亚洲各国和地区自身的原因。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始于发达国家，但受伤较深的常常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本地又缺乏足够成熟的企业，在此轮危机冲击下，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也显露出自身的脆弱性。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体化的欧盟模式受挫，东北亚局势日趋紧张，这些内外“变量”都为亚洲未来走向增添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打破这一“不确定性”，亚洲成员必须进一步提升共同体意识，摒弃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大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当前亚洲经济体之间相互高度依赖，但各国政策制定者仍习惯孤立地应对冲击事件。例如，面对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英国脱欧和印度货币改革带来的冲击，亚洲成员并没有采取基于共同利益的联合政策行动。反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经济之所以遭受重创，其最大的教训就是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危机面前各自为政。

有人也许会问，各国政治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也不一样，真能走到一起吗？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亚洲各国和地区都面临着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因而，更高程度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有助于亚洲各国和地区实现其发展目标，也是亚洲经济走出当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当前中亚、中东、南亚、东盟等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有些则刚刚起步，需要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这正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所长。同时，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通过合作，亚洲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互联互通大有可为。在这种互补性基础上开展产能、技术、装备合作，既能消化输出国的优质富余产能，又能促进接受国的工业化，并实现发展目标，可谓一举数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机遇。

上图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媒体领袖圆桌会议”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0多个国家的20余位媒体领袖汇聚一堂，围绕“亚洲媒体合作新未来”的主议题，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媒体合作。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右图 在博鳌官方新媒体平台服务区，与会嘉宾在体验VR直播。 本报记者 朱 琳摄

特写

把“中国制造”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 朱 琳

当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大步迈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中国工匠，打造中国品牌已被正式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什么是工匠精神？如何培养这种精神？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一场围绕“工匠精神：把‘制造’做到极致”的讨论尤为热烈。

“善于学习、勤于攻关，并且持续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琦这样定义。“如果不求改善，不思创新，我们岂不是没办法与机器竞争？”

意大利Candy集团洗涤事业部总监奥尔多·福玛加利认为，工匠不是教出来的，只有通过不断地摸索和自我修炼才能让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产品品质更卓越，而且经久不衰，“工匠精神需要专注。为了一项技艺的传承、改善和发展，要求他们付出毕生精力，乃至几代人的才智和精力”。

“尽管现在的大学生都希望进入办公室工作，但我们依然非常需要一些人才，他们了解制造工艺，愿意在车间埋头工作，并且知道怎样用手来精打细磨，而不仅只是一心想成为做项目开发的高级工程师。”德国莱茵TUV集团管理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富比特别指出，对于小批量产品，以及一些高精尖的仪器、设备的生产，高技能的工匠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

“工匠精神，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食品或者是中国乳业来讲，是把追求品质放在核心位置的一种价值观。”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说，创新是工匠精神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为工匠精神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用品质做你的核心价值观，用创新做你的竞争力，把更高的标准作为一种新常态，这对于中国所有消费品行业来讲，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工匠精神”。

日本景观设计师枡野俊明认为，所谓工匠，不是一味地追求产品功能多样，不是盲目地追求生产成本降低，也不是追求个性的鲜明，“工匠除了有好的技术，还要有思想。思想反映我们活法。把这些统一起来，我们把这视作工匠精神”。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机器人取代不了工匠精神的这些内涵。因为没有工匠，就没有机器人，没有研发，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机器人。但是，不传承是不行的”。他中肯地提出，重视职业教育，能够一代一代把传统文化梳理传承，才能使今天的社会尊重工匠和工匠精神。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工匠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热情，一种奉献。

现场

中国创新DNA越来越强

本报记者 袁 勇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硅谷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哪些因素？中国的创新又有哪些特点？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创新者的DNA”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

提到创新，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硅谷。这个诞生了众多顶级科技公司的地方几乎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为什么硅谷可以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中心？它有何独特之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创新文化成为众多嘉宾特别指出的因素。

以色列著名创业投资人尤西·瓦尔蒂认为，硅谷独特的创新文化十分重要，“对于硅谷为何成为创新中心的说法有很多，我认为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硅谷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于失败的高容忍度，对塑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Oculus天使投资人罗根·阿林认可尤西·瓦尔蒂的说法，他特别指出，硅谷还拥有特殊的分享文化，“在硅谷，有一种热衷于互相给予的分享文化，比如开源软件，就对年轻人创新能力的培育十分重要”。

与硅谷一样，以色列也以其突出的创新能力闻名于世。作为中国和以色列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合作成果，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成立，成为中国引进以色列优质创新资源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李剑阁介绍说：“以色列理工学院有着独特的创新DNA，其23%的学生，在一生中至少创立过一家企业。以色列人口不多，但是以色列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中数量排名第三。通过创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我们可以直接吸纳众多创新资源。但是，我认为创新DNA是不可以复制的，却是可以嫁接的，这次合作便是这种创新嫁接的重要尝试。”

近些年，中国的创新氛围越来越浓厚，创新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罗根·阿林就对此印象深刻：“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领域，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年轻人的身影。可以说，中国的创新氛围已经很好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我可以感受到很多类似硅谷的创新精神。”

百度总裁张亚勤曾在微软工作过多年，到百度工作后，又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张亚勤认为，中国的技术创新，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自主，再到引领的过程。“以中国的互联网创新为例，第一阶段基本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产品大都是从美国仿制来的。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就做了很多自主创新，比如微信、移动支付、地图等产品，中国做得比国外的好。过去几年，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以及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中国的创新开始引领世界，我们越来越接近创新的核心和基础架构。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在很多领域的创新也开始比硅谷更加积极。”张亚勤说。

然而，在中国创新大步前行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张亚勤表达了他的担忧：“在创新发展很快的同时，大家好像也有些不耐心了，想马上看到成果，上市赚钱，于是产生了很多泡沫。比如人工智能，好像我们一夜之间就要被人工智能改变，大家一哄而上，都在做这件事。”

飞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谢青对此也有体会：“中关村有很多创新企业，其中有些太急功近利，大家好像太专注于速度，这会使企业缺乏创新的可持续性。比如我们正在做的安全处理器，一般需要5年到10年才能出成果，也需要长期的投资，但是一旦做成了，就会形成长时间的优势，这时候就不能急功近利。”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徐 胥